

“蝇蛆行动”:扭转中国战场的一次战略空运

1944年4月17日,日军动员52万兵力发起“一号作战”,这是日本对中国正面战场发起的最大规模进攻,国民党军队在整个战线上只能用“兵败如山倒”来形容。

美国总统罗斯福对中国战场的前景忧心忡忡,因此以强硬态度致电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要求他迅速将所有兵权都转交给盟军中印缅战区司令魏德迈。

然而这并未挽救国民党在战场上的危机,直到1944年12月为止,美国援华第14航空队位于衡阳、零陵、桂林、柳州的基地相继沦陷,日军先遣部队进入贵州独山,直接威胁昆明与陪都重庆的安全。昆明是美军从英属印度经“驼峰航线”向中国战场“输血”的重要基地。于是魏德迈决定将部分在缅甸作战的中国驻印军迅速调回国,抵抗日军兵锋。

当时的缅甸战场,同盟国已完成对缅甸北部的反攻。于是,魏德迈决定从中国驻印军新六军(军长廖耀湘)中抽调第14师与新编22师送回中国内地。依据北方战区司令部参谋人员评估,这场代号为“蝇蛆行动”的军事行动将会推迟滇缅公路打通计划约一

月到六周时间,而身为盟军东南亚战区最高统帅的英属印度总督蒙巴顿勋爵也对该计划持反对态度,认为将那么多的运输机投入运送国民党军队回国的行动,对盟国在东南亚的反攻计划是一种“浪费”,但这没有动摇魏德迈保卫中国大后方的立场。

根据同盟国方面的安排,“蝇蛆行动”以缅甸五座机场为基点,分别是萨茂、瓦拉查、南新与密文那的北、南机场,另外英属印度阿萨姆邦的雷多机场也被纳入这项行动。

“蝇蛆行动”由第10航空队司令霍华德·戴维森准将全权指挥,并由其副司令格鲁伯斯上校负责以口头命令方式监督空运部队进程,这是因为部队在移动时所遭遇的变故非常多,因此通过口头下达即时命令远比文书履行更符合实际情况。另外,基于中国境内缺乏现代化地面交通设施,美军干脆“好人做到家”,决定运送大批马匹和驴子与中国军人一起回国,以加强部队的机动性,牲口的输送特别交由第1空中突击大队的第319运兵团中队与第2空中突击大队的第317运兵团中队执行。

出发前,美军机组发现飞机水平尾翼被中国官兵拿来当黑板,写上许多汉字,仔细识别其中的内容,有“到达了他国必须……”以及“礼、信、义、孝”等字眼(见图),似乎是军官教导搭机士兵出国以后的规矩,这也反映出当时新六军基层军官并不知道他们此行是要回国作战。

在第10航空队、空运司令部、北方战区司令部以及新六军官兵的配合下,“蝇蛆行动”从1944年12月2日到1945年1月5日的一个多月时间内,有1596匹驮马与驴子、42辆吉普车、48门75毫米山炮、42门4.2英寸迫击炮、48门37毫米反坦克炮被先后运抵中国的陆良、沾益、昆明、呈贡、楚雄等机场。人员部分,则有20105名中国官兵以及249名美军通过空运迅速进入中国,前者除了第14师与新22师之外,还有新六军军部,后者则是美军第1重迫击炮团,第

45、60野战医院以及第988通信连。

在执行作战任务的24天内,空运总队印中师只损失了3架C-47运输机,而在运送动物的时刻,也只发生了一次马匹在空中抓狂的意外事件(最后被机组成功驯服),可以说是驼峰空运历史上最成功的一场作战任务。

“蝇蛆行动”是中国历史上首次战略空运行动。由于有了经验,稍后盟军空运司令部印中师的第2空运中队又展现出令日军望尘莫及的空中运输能力,其中在1945年1月22日的一天之内,居然能在日军攻占江西遂川、赣州前夕将两座基地内的盟军官兵全部转移。而当日军于1945年4月对中国发动旨在夺取芷江的最后一场战略攻势时,空运司令部也依据“蝇蛆行动”的经验,制订“公鸡行动”,迅速将早先由缅甸运往云南的新六军再次空运到湖南前线,配合王耀武的第4方面军、汤恩伯的第3方面军以及王敬久的第10方面军,共同粉碎日本第20军的攻势,国民党军队总算在正面战场上进入“转守为攻”的状态。

(摘自《档案春秋》雷炎/文)

唐代为何动不动就“贬为司马”

唐朝的地方行政区划以州县二级制为主,州长官复称汉朝的刺史,由都督统管,都督下领州县,州下领县,所以县是地方的基本行政单位。州郡长官由中央任命,负责管理州内政务和县令,地方佐官如司马、司户等,都是协助州郡长官和县令处理政务的。

但是这个繁荣的贸易区在1517年发生大火而被夷为平地。1662年,托尔格重建开张,被改称“红场”。之所以称之为红场,是为了纪念映红了半边天的那次火灾。另一层的含义是,这里的“红”,在古俄语中是“美丽”的意思,“红场”也指“美丽的广场”。但是这个广场在100多年后再一次被大火焚毁,1812年,红场不得不第二次重建。

20世纪20年代,红场第三次扩建时,将邻近的瓦西列夫斯基广场合并,最终形成了今天的规模。为了符合“红场”这个称呼,广场多采用红色的方砖石料建造,从而形成了今日红场的红色风情。

但是,“红场”之名比俄罗斯人崇尚红色的历史,特别是

红色革命史要长得多。15世纪末,号称“全俄君主”的伊凡三世在莫斯科城东设立平民级的自由贸易市场,称之为“城外工商区”,俄罗斯语为“托尔格”,意为“集市”,这是红场的最早开发记录。

但是这个繁荣的贸易区在1517年发生大火而被夷为平地。1662年,托尔格重建开张,被改称“红场”。之所以称之为红场,是为了纪念映红了半边天的那次火灾。另一层的含义是,这里的“红”,在古俄语中是“美丽”的意思,“红场”也指“美丽的广场”。但是这个广场在100多年后再一次被大火焚毁,1812年,红场不得不第二次重建。

20世纪20年代,红场第三次扩建时,将邻近的瓦西列夫斯基广场合并,最终形成了今天的规模。为了符合“红场”这个称呼,广场多采用红色的方砖石料建造,从而形成了今日红场的红色风情。

(摘自《人生与伴侣》刘创/文)



45、60野战医院以及第988通信连。

在执行作战任务的24天内,空运总队印中师只损失了3架C-47运输机,而在运送动物的时刻,也只发生了一次马匹在空中抓狂的意外事件(最后被机组成功驯服),可以说是驼峰空运历史上最成功的一场作战任务。

“蝇蛆行动”是中国历史上首次战略空运行动。由于有了经验,稍后盟军空运司令部印中师的第2空运中队又展现出令日军望尘莫及的空中运输能力,其中在1945年1月22日的一天之内,居然能在日军攻占江西遂川、赣州前夕将两座基地内的盟军官兵全部转移。而当日军于1945年4月对中国发动旨在夺取芷江的最后一场战略攻势时,空运司令部也依据“蝇蛆行动”的经验,制订“公鸡行动”,迅速将早先由缅甸运往云南的新六军再次空运到湖南前线,配合王耀武的第4方面军、汤恩伯的第3方面军以及王敬久的第10方面军,共同粉碎日本第20军的攻势,国民党军队总算在正面战场上进入“转守为攻”的状态。

(摘自《档案春秋》雷炎/文)

为什么结婚的人会更穷

法,人们对某种事物的感受效用比财富数据更具价值。

结婚的人幸福感也更高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丹尼尔·卡尼曼做过一个关于婚姻和养育孩子对人们幸福感影响的试验,结果也是婚育组的幸福感更高。这个试验除了受试人群的表述的客观性值得商榷,对人性的复杂一面也有颇多体现。

婚育组人群在描述婚姻和养育儿童的事务的繁复时,表示那是非常无趣的,但总体上看,他们又觉得那些事给自己带来了很大的幸福感。

当然,问题也可能有另一个角度的解释,从人们择偶的世俗标准来看,那些原生家庭富裕、心灵手巧、善于与人相处、体健貌端的人本身就更容易吸引人们的注意,获得适配人群的好感,他们的婚姻保持稳定的概率更高。既然有钱人和更善于赚钱的人获得稳定婚姻的概率更高,那么从统计结果来看,当然是处于稳定婚姻的人掌握了更多的财富——不是婚姻让人们更富有,而是没钱的人在独身者中占了更高的比例。

婚姻能让人更富有吗?沃伦·巴菲特是这么认为的。他用网球举了个例子。网球选手兼网球教育家西蒙·拉默写过一本给初学者看的小册子《出手不凡的初学者》。拉默在书中强调,非职业选手想在社区友谊赛里取得耀眼的成绩,不在于你获得多少个发球直接得分,更重要的是尽量减少比赛里的“非受迫性失误”。更确切地说,业余比赛不是在比谁的网球峰值技术更高,而是在比“在对面的胖子踩到自己鞋带之前,要把球正正经经地打回他的场地”。普通的财务决策与此类似,关键不在于你能否发现

从更高的层级来审视婚姻给人带来的“效用”,会怎么样呢?按照感受经济学的说

唐朝历史是海纳百川、包容并蓄的历史,是多民族交往交融交流的历史。粟特人在中国史籍中被称为昭武九姓、九姓胡、杂种胡、粟特胡等,因善于经商而著称。原本生活在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泽拉夫善河流域,即古典文献中所说的粟特地区,主要范围在今乌兹别克斯坦。由于经商和战争的原因,粟特人在汉唐之际沿着丝绸之路大批向东移民中国。我国塔里木盆地、北方地区,以及蒙古高原都有他们的移民部落。

安金藏的壮举,一时震惊朝野。武则天得知后,大惊失色,立即下令用辇舆将安金藏抬入禁中,命太医全力救治。太医为他装回肠子,第二天安金藏奇迹般地苏醒了。武则天亲临探视,感叹:“吾有子不能自明,不如尔之忠也。”她下诏停止此案,李旦得以免于构陷。安金藏此举影响深远。首先,他显而易见地激发了舆论对李旦的同情与支持。武则天也开始反省自己对待子女的态度,最终变“尊武抑李”为“合同李武”。武周政局为之一变,安金藏的壮举在其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日后,李唐王朝能够复辟,不得不说是安金藏的壮举。其次,安金藏拯救了软禁中的李旦一大家子人,里面有两位日后的皇帝。一位是二次登基的唐睿宗李旦,另一位则是将大唐王朝推向辉煌巅峰的唐玄宗李隆基。无论从政治转型而言,还是从直接救人角度而言,安金藏都是李旦这一系,也就是之后李唐皇室的大恩人。(据中国国家历史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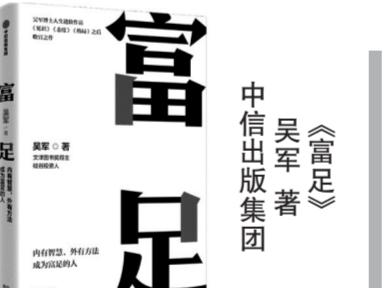
的,后来发现尼采提出过类似的观点:“生活有意义,就算在困境中也能甘之如饴;生活无意义,就算在顺境中也度日如年。”当然了,我相信独身者的生活肯定不会是度日如年。只不过,平均来说,独身者没有把不用解决夫妻间矛盾、养育儿童而省下来的时间用来增加自己的财富水平或者让生活更有“意义”——这不能怪独身者们,因为人生中本来就没那么多有“意义”的事。

这有点像吸烟成瘾者对劝告者的反驳。一个人劝告他酷爱吸烟的朋友:“你如果不吸烟,省下来的钱都够买一辆法拉利了。”对方反问:“你倒是不吸烟,但你的法拉利在哪儿呢?”

婚姻也许是一种很糟糕的选择,但很可能其他的生活方式还不如它。我没有催人结婚的意思,你依然可以喜欢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

(摘自《第一财经》2025年第2期 崔鹏/文)

什么是真正的从0到1



盖茨创办微软、乔布斯创办苹果、佩奇和布林创办谷歌,从严格意义上讲,都不是从0到1的过程——操作系统不是盖茨原创的;乔布斯在发明苹果之前,其他公司已有类似的产品;网页搜索在谷歌之前已存在。不过,如果把从0到1的定义,从无到有改成从科学到技术再到产品,最后到商业成功的全过程,那他们又都当之无愧。

发明青霉素的例子可以说明,光靠运气或灵机一动,是远远不够的。亚历山大·弗莱明因为偶然的发现,找到了能够杀死细菌的青霉素,但培养皿中的霉菌并不能直接入药。另一位科学家霍华德·弗洛里注意到了他的研究成果,带领着一支强大的科研团队,从青霉菌中分离和浓缩出青霉素。即便如此,也不足以给人使用。于是,弗洛里说服了英国和美国的各大药厂,投入上万名工程师,一起解决制药中的工程问题。再后来,麻省理工学院

的科学家希恩人工合成出青霉素,这才让这种神药能够量产,而且便宜到全世界都用得起。至此,发明青霉素从0到1的全过程才算走完。

如果不能解决工程问题,只有技术,创新可能就会被埋没。正如一家初创公司打造出一辆能跑的新能源车不是难事,但能够一个月生产出一万辆车,而且保证品质,就是另一回事了。

由此可见,从0到1显然不是有一个好想法或者发明了一项新技术就算完成了,而是要走完从想法到技术再到大家真正受益的全过程。只有完成了最后的那个“1”,之前所做的工作才能体现出价值。

皇权传承难题,是武则天面临的权力悖论。在武周王朝早期,或许是出于改唐为周的惯性,武则天“尊武抑李”,对李唐宗室猜忌防范,动辄大肆屠戮。武则天的幼子李旦退位为皇嗣,因身份敏感,终日惴惴不安。很快,有人告发“皇嗣异谋”,武则天下令酷吏来俊臣审问。李旦身边侍从迫于严刑威逼,有人做伪证、有人自诬谋反,眼看“李旦谋反”就要定案。粟特人太医署医工安金藏在李旦身边当差,也在受刑之列。他坚称李旦清白,见诬陷即将成真、人头即将落地,奋力大呼:“公不信我言,请剖心以明皇嗣不反